

戴维文集

DAI WEI WENJI

●戴维 著

(一)

春秋学史

戴维文集

DAI WEI WENJI

●戴维 著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戴维文集 / 戴维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5.8
ISBN 978-7-5561-1008-7

I. ①戴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传统文化—中国—文集②经学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K203-51②Z12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210438号

戴维文集

著 者 戴 维
责任编辑 曹伟明
装帧设计 天问文化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http://www.hnppp.com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
印 刷 湖南省誉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 29.25
字 数 50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61-1008-7
定 价 58.00元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 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（全四册232.00元）



戴 维



与妻子陈见红、女儿戴明一



与父亲戴凤阳、母亲余世忠及三个妹妹（左起戴孟奇、戴孟娇、戴孟兰）



浏阳一中八四届高139班毕业留念 戴维（后排右八）



与友人许仁龙（右二）、张昆晋（右三）、张成福（右四）



与许云龙先生参观隐山



与友人胡瑜良（左一）、黄苏民（左三）、毛娟（左四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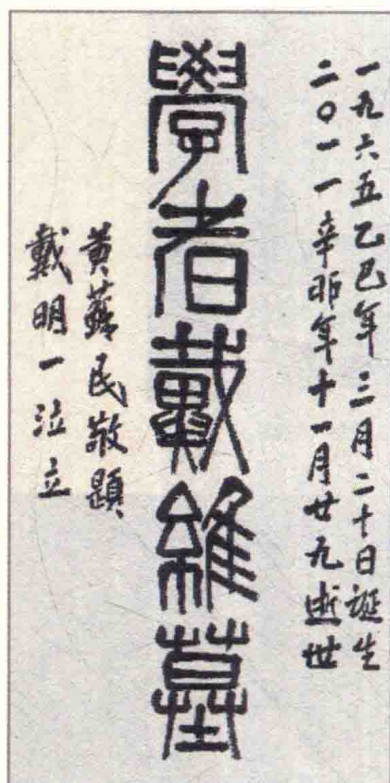
与同学陈庆志（中）万天雄（左）



戴维（前排左一）与赖涛生（后排左一）等高中同学



戴维（前排中）与大学同学



碑文照片 黄苏民书丹



获奖证书

《戴维文集》序

夏剑钦

为纪念故友戴维先生辞世三周年，其挚友陈庆志、王纲、万天雄、凌立明、赖涛生诸君，在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，协力将戴维生平著述辑成二百余万字的《戴维文集》，付印之际再三嘱为赘序其首。余嘉其笃友厚谊而难违其请，于是不烦旧话重申，略缀数语以再悼吾友。

我与戴维的初次相识是在1983年的秋天，那时先师邓潭洲先生尚未调回省社科院，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政理室做编辑工作，我则在人民社辞书编辑室。我们都住在上大垅的省出版局宿舍，邓老师住四楼，我在六楼，我就是有一天晚饭后上邓老师家见到戴维的。那时他才18岁，小伙子高挑清瘦，隆鼻深眼，言行举止彬彬有礼。通过邓老师介绍，知道戴维也是浏阳人，是个真正的读书人，从小偏爱古文，在浏阳一中读高中时就喜欢中国哲学，儒释道的书都看；现在在长沙商业财经学院读二年级，专业课之外就到图书馆去借书，目前正在借阅各家关于《老子》的著述。我很高兴能结识这个年轻的读书友，但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钻研《老子》，还经常向邓老师请教，书信向任继愈、许抗生等哲学家请益，并开始完成其15万字的《帛书老子校释》初稿。此后我们竟各忙各的，一别而十多年不见。

1998年正月，戴维第一次访我于岳麓书社宿舍。我们这次聊得很多，知道他1985年专科毕业后分配到长沙小百货站工作，先后任会计员和会计主办，业余时间不打牌、不唱歌、不游玩，唯一兴趣只在读

书、买书，兼及目录、版本和文物字画。会计工作虽胜任有余，但毕竟非其所好，心不在焉。幸而从1992年开始，单位经济效益日渐萎顿，上班已是时停时止，后单位领导干脆来个顺水人情，将这“书痴”作内退办理，按月给点生活费，成全了戴维的一心向学。此后10年，戴维便白天在图书馆、博物馆或书店里读书、查资料，夜间潜心研习，由诸子而经史，无日不有定程。由是不仅读书成癖，而且买书也成癖了，至今藏书已逾万册，且有不少稀见之手稿和珍善本。要买书就得节衣缩食、省吃俭用。戴维生性质朴，恬淡寡欲，为省钱买书而连饿两天或不买菜票先买书的事常有发生。对于这一点，他父母和爱妻都很理解，并支持他买书。

当然，他这次来的目的，是想出版那部早已成形并修订过的《帛书老子校释》。我由于非常看重他这个作者和这部书，便随即同意在社正常出版。不意这本小书出版后，书中那些“不敢藏私”的新观点和解决的疑难问题，竟引起了数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的兴趣和注意，尤对此书《关于帛书〈老子〉甲本中的圆点标志》一篇中的见解褒奖有加，并表示他们研究《老子》将以该《校释》本为参考书之一。此书编后，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日益频繁，情谊日笃。

2001年春，我已由社长岗位退下来专事《魏源全集》的编校工作。某日，戴维带着他那部已沉潜钻研了三年的书稿《诗经研究史》到我家，一是谋出版，二是想请我给写个跋（写序已拜托钟叔河先生）。我粗翻了一下书稿，便惊服他那种积年累月在书山“采铜”索隐、细心爬梳的韧劲和硬功夫，深知在学术界弥漫浮躁之气的今天，恐怕也只有戴维这样执着、认真的“书呆子”，才能做《诗经研究史》这样的大学问。而且他还表示，准备将整个经学史都系统爬梳一次，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的史料都已在搜讨。我被他的学术勇气和甘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所折服，加上同乡、同好、同情的因素，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谋划出版。但考虑到出这种学术著作，出版社是要赔钱的，我刚退下来就要岳麓社赔本出书，肯定不合适。于是我想到了财大气粗的湖南教育出版社，老同学曾果伟在那儿当社长，找他说说或许可以玉成此事。果然，曾果伟和副社长陈民众都愿意支持出版，开头说不给稿费，后来

考虑到戴维的经济状况还是给了稿费。不仅如此，2004年他们还支持出版了戴维的第三部著作《春秋学史》。

也就是在出书的过程中，戴维凭着自己的学术功底和为传统文化研究而献身的精神，赢得了文化出版界诸多人士的关爱和帮助，钟叔河先生是他的忘年交，湖南大学黄梓根博士和陈民众、符本清、寻霖、黄苏民、黎锟等都是他的亲密朋友。《湖湘文库》文化工程启动后，戴维从2006年起就被聘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的特约编辑，负责编校整理了《汉书窥管》、《积微居金文说》、《四库提要辨证》、《湖南地理志》等著作，约300万字，又负责校点《南史校证》80卷和《中国社会史料丛钞》，约150万字。编校工作之余，他还担纲与人合著《湖南历史文化世家·浏阳欧阳氏卷》，为此而搜寻资料，调查访问，三易其稿，终于2010年1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可想而知，他这五年间参与《湖湘文库》编辑、校点和著述工作的任务之重、难度之大，是绝非一般编辑所可承担的。

戴维早年得过乙肝，2010年冬父亲病重时，他已隐约感到肝病要复发，但他没有上医院，而是抓紧时间将四年前已成形的《论语研究史》一稿修订一过，“亟谋出版”，想让父亲最后还能见到他的这部新书。因为他父亲太看重他的学术成果了，每有新书问世，父亲都是爱不释手，反复品味。不意这次未等及《论语研究史》出版，父亲竟一病不起，没能见到这部新书，后来戴维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：“而先父见背，不及见矣，痛如之何！”

父亲去世后，戴维仿古人丁忧守制之规，数月不剃头、不刮胡须。办完丧事后不久，戴维到我办公室来，只见满嘴胡茬，蓬头长发，见面先施礼，然后说：“老师，家父已入土为安，我平生的大事做得差不多了，眼下想的就是要把《论语研究史》印出来，出完了这本书，我真想到寺庙去安心读点书。”我听后有些诧异，一边说他孝心可嘉，但出家大可不必，何况女儿才上高中，一边安慰他出书可以找岳麓书社，并答应帮他给曾德明副社长打电话。随后戴维携稿到岳麓书社，因为德明同志亦是素重学术，所以两人初次谋面却一见如故，当天就签约《论语研究史》一书由岳麓书社正常出版。

无奈天公妒才，戴维的肝癌之疾于2011年夏真的发作了，他不仅不能践行春间承诺加盟湖南大学文化研究院，襄助姜广辉先生撰著《三礼研究史》之事，而且《论语研究史》的校样也只能在重病中审阅。他广州化疗后住株洲妹妹家，我与符本清同志前去探视，他的精神状态与容颜尚可，每天服药之外还坚持看书、散步。家人劝他多休息、少看书，他还说看病治疗是医生的事，吃饭看书是我的事。

无奈病魔无情，戴维终于12月23日清晨辞世，享年仅47岁！我与符本清同志于26日到浏阳参加了戴维的追悼会，庄重肃穆的灵堂，四周墙上挂满的挽联、条幅，特别是灵堂内外泣不成声的亲友，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震惊。为什么一个平头百姓、民间学人的离去，能牵动整个家族、家乡、同学、朋友和湘湖文化界诸多人士的心？为什么来自北京、广州、宁波、杭州和长株潭的文化界、学术界朋友吟诵的诗词、联语会如此的真诚情深？有的说“读书种子去了，三湘痛失斯人”，有的说“立身是真君子，传世有好文章”，有的说：“廿五年著就信史堪称司马，数十载修成大德可比颜回”，我则曰：“作史纶经著苦辛，一生功业在书林。秉性早传存朴厚，素心终始见真淳。”我想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大家都深知戴维是一个与世无争的真正的读书人，一个不为稿费、不评职称，更不为升官的真学者，而且是一个誓为学术献身已著作多多的大学者。戴维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，或许他的著作人们不一定都喜欢读、都看得懂，但人们却都那么敬重他、仰视他，这也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还有很强的生命力，“文化兴国”还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。

人生在世有很多种活法，可能有人会认为戴维那种为学术研究而苦行僧的清贫一生太不值了，但我却非常钦佩戴维不断追求的人生高境界，认为其学养之深厚，境界之高远，或许是时下好多衔名赫赫的专家教授只能望其项背的。西人罗素的人生哲学，浓缩在其“吾生三愿”之中，即：“吾生三愿，纯朴却激越：一曰渴望爱情，二曰求索知识，三曰悲悯吾类之无尽苦难。此三愿，如疾风，迫吾无助飘零于苦水深海之上，直达绝望之彼岸。”戴维的一生同样受着这三种激情的支配。他深爱着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女儿和兄弟姐妹，还真诚无比地关

爱着他的师友和亲朋。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，他在临终遗言中还这样写道：“《论语》‘启予手，启予足’，今临终始得索解，死亦足矣！”这“启予手，启予足”，是《论语·泰伯》篇中曾子临终召门弟子说的话，句意为：大家看着我的手，看着我的足，这受之父母的身体手足还保全无损，我从今而后再不必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地担惊受怕了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这是“孝”之始，戴维临终仍惟恐愧对父母，对曾子的话真正索解，可见其对父母的孝敬眷爱之情是何等之深！他一生对于知识的追求，自不必再赘说。至于“悲悯吾类之无尽苦难”，他虽生活在最基层，一生低调、清贫，似乎已“弱势”到无力再去关爱、怜悯别人的苦难，但凡接触过他的人却都知道，只要你有为难或困难之事，他知道了，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你；而且因为他人缘好，待人真诚，愿意帮他给你共同解难的人多，你的为难或困难问题最终总会由他或他的朋友帮助解决的。这就是戴维力所能及的“怜悯”和大爱。所以我总认为，戴维的人生虽然苦短，但他活得充实，活得有境界，而且乐在他不断追求的事业中，他的不朽著作和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必将长留于人世。

(一)

春秋学史

序

吾友戴维的第三部专著《春秋学史》又已排出清样，冀余先睹并为之序。余虽于经学知之尚浅，不敢贸然置词，但同乡知己之情深而难却，窃意即使是佛头著粪，此序亦在所不辞。适余近年正潜心编校《魏源全集》，默深氏之《春秋》诸论及其发挥今古文微言大义的经学思想尚热在心，正好借此与吾兄相切磋，并充序言之数。

盖《春秋》一经历来被儒家奉为治世平天下的经典，认为孔子空言垂世，所以为万世师表者，首在《春秋》一书。特别推崇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功可谓“天下一治”的是孟子。孟子曰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可见《春秋》之作，是孔子用以定名分、制法度，以息邪说，以禁暴行，提倡王霸、王道等天子之事的。在孟子看来，孔子春秋之笔、褒贬之辞的微言大义，是足以治万世之天下的。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曰：“《春秋》有大义，有微言。所谓大义者，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；所谓微言者，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。”正因为此，历史上大凡“世衰道微”之时，总会有人借阐释《春秋》微言大义这个法宝，为其讨乱诛暴或变革社会作舆论上的准备。活跃于清代嘉道之间的魏源最是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”，早年即与龚自珍意气相投，深感“群趋于考据一途”的乾嘉学实在于世无裨，更丝毫无济于解决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和社会矛盾，而只有师从刘逢禄后接触到的常州之学，才是有益于救世的良方。于是努力发扬光大，使苏州、徽州之外原不显于当世的常州《春秋》之学，至道、咸以降逐渐取代苏州惠氏和徽州戴、段、二王之学，而成为晚清学术思想

的主流。

魏源二十岁随父入都，“遂留从胡墨庄先生问汉儒家法……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榘，学《公羊》于刘申受先生逢禄”（魏著《邵阳魏府君事略》），从而得窥常州之学，并以“经术为治术”，破立并举，提出自己经学经世的救时主张，逐渐转变了一代学风。

魏源治学，主张“通经致用”。他在汉、宋两学方面既已步入堂奥，便能“食笋去箨”，鞭辟入里，一方面抨击汉学家烦琐考证和宋学家空谈性命的流弊，认为“偃竹为汉，空腐为宋”，一方面揭批乾嘉学者群趋于考据一途的无用与误国。他认为：“自明以来，学者争朱、陆；自本朝以来，学者争汉、宋。今不令学朱学陆而但令学孔、孟焉，夫何诤？然近日治汉学者，专务记丑，屏斥躬行……以诂经为生安之学，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。”（《论语孟子类编序》）可见魏源最不满于乾嘉之学的，就是这种“屏斥躬行”，而以诂经记丑相标榜，反以为自己所为是孔门的生安之学，而贬斥践履是困勉之学的颠倒之见。他主张通经致用。复兴西汉今文经学，就是因为今文经学主经世、重实用，而不像乾嘉之琐委与无济于世。他说：“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，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、唐，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、晋……今日复古之要，由诂训、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，此齐一变至鲁也；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，贯经术、政事、文章于一，此鲁一变至道也。”（《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》）魏源论学的目的，也就是要努力扭转乾嘉的颠倒之见，而以经术政事为首、为本，使经学、政事、文章统一起来，为国计民生服务。

在批判乾嘉之学的同时，魏源认为“再世必变”，已是复兴西汉微言大义的时机了。而要复兴西汉今文经学，只有常州庄存与、刘逢禄的《春秋》经世之书，才是“救禔当世”的“真汉学”。因而他对常州今文经学由衷赞扬，说庄氏之学“萃乎董胶西之对天人，醴乎匡丞相之述道德，肫乎刘中垒之陈古今，未尝凌杂钜析，如韩、董、班、徐数子所讥”（《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》），是“真汉学”。认为刘逢禄是“潜心大业之士”，能“由董生《春秋》以窥六艺条贯，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，旁搜远绍，温故知新，任重道远，死而后已”，是“明允笃志”的“君

子”（《刘礼部遗书序》）。

魏源主张复兴西汉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，并由此继承和发扬常州今文经学，其目的显然不在于今文经学本身，而在于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可以相通，因而可借以求裨当世，服务于国家的治兴。为此，魏源一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，为破旧学、兴今学而通经致用，阐发古经的今文义旨，发愤撰著了《诗古微》、《书古微》、《董子春秋发微》和《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》等经学著作。

魏源于诸经的研究中，尤为重视《尚书》与《春秋》。对《尚书》则尤以其《洪范》篇为要，认为它对决定国家大政有指导性意义。他说：“《洪范》八政，始食货而终宾师，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。”（《默觚下·治篇一》）“食”“兵”二政，就是经济与军事，对国家政权来说至关重要。因此魏源特别重视，编纂了《明代食兵二政录》，以求有益于当世。对《春秋》的研究，前人多重何休而忽视董仲舒，魏源则特别注重弘扬董氏之学，认为其《春秋繁露》一书“宏通精淼，内圣而外王，蟠天而际地，远在胡毋生、何邵公之上。盖彼犹泥文，此优柔而饜饩矣；彼专析例，此则曲畅而旁通矣。故抉经之心，执圣之权，冒天下之道者，莫如董生”（《董子春秋发微序》），并撰著了《董子春秋发微》七卷（惜无传本，仅存序）“以发挥《公羊》之微言大义”。

在魏源看来，董仲舒的地位远在胡毋生、何休之上。试看西汉之初的一切典章制度，大体沿袭秦旧，并无太大的变动，而董仲舒却能在此境况下劝说汉武帝，提出一套变更的措施与理论，使得经术与政事密切相关，树立了汉代一朝的新官学。如此之气魄与识见，自为魏源所激赏，故许之以“抉经之心，执圣之权，冒天下之道”。由是魏源论《春秋》义旨，大多以董仲舒之说为根据，并进而将《春秋》大义伸展到其他各经的研究之中，而诸多要旨的集中体现则在魏源的经学代表作《诗古微》之中。孟子说：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”魏源认为《春秋》大义的尊王、攘夷、三统、王霸之辩、复仇之义等要旨亦必然含藏在《诗经》之中，因而他用尽各种论辩和诸多的考证，竭力阐发《诗经》的微言大义，并在阐发中不断表达自己对东汉经学的不满和对西汉经学的赞同。尤其令他敬仰不已的是西汉儒者熔经术、政事、

文章于一炉的通经致用精神，认为这不仅是治学的态度，更应是治世的重要根柢。

魏源对经学微言大义的发挥，不仅影响了晚清一代学风的变化，继往开来，“系乎百余年学术之升沉”，而且出乎其初衷和意料，竟成了清王朝最后崩溃之“祸始”。清儒叶德辉在《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序》中说：“光绪中叶，海内风尚公羊之学，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。其始发端于湖湘，浸淫至于西蜀、东粤，挟其非常可怪之论，推波扬澜，极于新旧党争，而清社遂屋。论者追原祸始，颇咎先生与邵阳魏默深二人。”（见张祖廉《娟镜楼丛刻》丁帙）可见《春秋》一经“奉天而法古”，几可谓是适应天下巨变的所谓治世之书。

吾友戴维继《诗经研究史》之后，又潜心数年对历代《春秋》学沿波讨源，探赜索隐，既融会前人之旧说，又不乏一己之发明，是又一部“力挽绝学于式微”的成功之作。余欣喜之情，莫可言状，因不揣固陋，乐而为此嚆引。

夏剑钦

2004年2月于长沙望岳楼